

过去一周,有关“上海高校集体‘落榜’教育部2011计划”,成为沪上教育界最敏感的话题——

“2011计划”倒逼高校“打破围墙”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易蓉

4月11日,教育部公布了“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并进行为期10天的公示。“2011计划”又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985”后第三个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性计划,其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推动高校的科技体制改革。

引发沪上教育界震动的是:14个首批入选名单中,上海高校竟然榜上无名。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华东理工等沪上著名高校,精心准备了十多个“协同创新项目”,在专家评审过程中,悉数落马。



“2011计划”对上海高校而言,并非诱人的“蛋糕”,而是艰难的改革。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公众存在误读

“2011计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教育工程?上海高校集体“落榜”,难道意味着本市高校科研实力、学科质量全面下滑?消息公布当天,记者就接到一位学生家长的电话,在他们心目中,“211”、“985”就是重点大学、国内名校的代名词,如今,“2011”与“211”、“985”齐名,上海高校无缘首批“2011计划”,就是实力不济的象征。这位家长表示,他的儿子今后将不再考虑报考上海的高校。

记者随后走访沪上几所高校,部分教师认为,“211”、“985”意味着国家财政的支持,现在多个“2011”,就是多一份钱,上海高校“落榜”“2011计划”,就是失去了一块诱人的“蛋糕”。

上述两种观点,其实都是对“2011计划”的误读。教育部明确,与“211”、“985”不同,国家推出“2011计划”,重点扶持的不再是哪所大学,而是必须组团参与。换言之,某所高校的学科实力再强,申报的项目再前沿,但只要是单打独斗的,就无法入选“2011计划”。事实上,已经入选首批“2011计划”的高校名单中,包括了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它们既非“211”也非“985”,有些甚至属于二本录取院校。

“2011计划”也不是钱的代名词。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在解读这项新计划时说,在过去的“211”和“985”建设中,中央和地方都投入了大量资金对相关高校重点扶持,但“2011计划”不再是以给钱为主,因为各地高校申报的协同创新中心本身已经有大量科研项目,有充裕的科研经费来源,还有着很强的吸金能力。据统计,全国培育的167个协同创新中心,已经吸纳了超过200亿元的社会资金。

王延觉表示,“2011计划”专项资金将用在现有体制投资不能解决的问题,如高水平队伍组建、协同机制、学者流动机制、学生培养方式以及资源共享方式等,在这些方面给予支持。

重点在于协同

既不多给钱,又不影响各高校的学科实力、名次,为什么教育部要推出“2011”这个全新的计划呢?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这样说:“‘2011计划’是个干事的计划,而不是一个分钱的计划,更不是一个划分高校层次的计划。”

袁部长所说的“干事”寓意深刻,它不是指某所高校、某个研究所的科研攻关,而是指针对某个国际上最前沿的科技领域,由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甚至包括企业,利用各种资源,形成合力,进而形成若干个国际上一流的实验室,在国际上占据科学研究的制高点。在“2011计划”机制下,创新的源动力在于合作,合力因素大于一切。

“2011计划”主要调研起草人之一、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说:“它通过瞄准更深层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来设计,新在不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它涉及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找到深度融合点,转化成生产力。这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产学研合作”说了多年,然而许多高校校长、企业总经理都深知,在旧有体制下,真正的产学研合作很难展开。即使在高校内部,不同学校之间也难以开展合作,这是我国高校科研成果长期与市场脱节的根本原因。

东华大学校长徐明雅向记者讲述一个事例:同样是碳纤维研究,上海就有多所高校同时申请经费,其结果呢,上面将科研经费像撒胡椒面似地一分,然后,各个高校各自为战,各自发论文了事,长此以往,何谈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

中科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说:“美国从基础研究中的一些发现到成为市场上的产品,仅需要6年,而我们往往还停留在写文章的阶段。‘2011计划’切中要害,高校再不整合资源,就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这回科研不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了”,中科院院士郭光灿风趣地说,“如果单靠大学,科研只能

止于文章,要真想做出东西来,必须靠协同。”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认为,“以往国家有课题,往往名头大的高校拿到的项目多。这次不论名头大小、排位高低,只要能在国家急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就是好样的。”

在公布的首批“2011计划”名单中,名列首位的量子物质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堪称“协同创新”的典范,它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联合组建,其中任何一家在国际量子研究领域都有顶尖实力,但按照“2011计划”的要求,不允许三家再单打独斗,而是必须组团参赛,于是,财力、人力、物力得到最有效的整合。目前,该中心聚集了20名院士和数百名科技精英,瞄准了国际最前沿的物理研究方向。

失利有偶然因素

记者了解到,上海各高校此次申报的“2011计划”项目,虽全军覆没,但个个符合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方向,也对接了科研领域的前沿,比如,复旦大学的“脑科学”、上海交大的“激光科学”和“未来媒体网络”等,都是面向未来且蕴涵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华东理工的“能源替代”项目,更是瞄准了我国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眼下最棘手的问题。那么,为何项目纷纷落马?

就在“2011计划”首批名单公示的第二天,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率队来到上海,听取各所大学意见。上海交大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燕刚教授参加完讨论后认为,上海高校未能入围首批“2011计划”名单,并不能说明上海高校在科学研究、协同创新方面没有能力,而是上海高校、“协同创新计划”设计者都对这一新政策的具体目标还没有特别清晰的把握,上海高校在申报时对“计划”的定位理解存在偏差。

刘燕刚说,从首批入围名单来看,与行业紧密相关的高校和项目入选率更高。而上海高校推出的项目,聚焦在前沿学科,思路比较超前。这些项目并不像交通、化工等和

当前产业结合紧密、聚焦方向更现实,其未来趋势、市场应用很难使评审专家有清晰感受。这样一来,上海的项目在投票时就没有优势,刘燕刚举例说:“专家有4票,首先投宇航、发动机等大家都认可的国家大需求,接下来的有限票数,专家肯定会投给‘拿得准’的项目。”

刘燕刚认为,专家投票确实存在偶然性因素,但我们也要看出上海高校目前存在的问题。“2011计划”的核心是“协同”、“合作”,而上海各所高校间的协同一直比较保守,合作规模不大。很显然,“2011计划”对上海的所有高校而言,并非是一块“蛋糕”,而是一种倒逼、一种艰难的改革,如何打破学校与学校间的“围墙”、如何突破“画地为牢”式的学科界限、经费制度、人事制度,将是摆在上海高校眼前的一道难题。也许,此次上海高校集体“落榜”是件好事。

力争第二轮入围

“2011计划”并非只评选一次,第二轮评选即将展开。目前,沪上高校都在完善项目申报,力争在第二轮入围。对于高校间“协同创新”,华东理工科技处处长牟伯中教授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说,比如学校申报的“能源替代”项目,华理的长处是“煤气化”,在国内无人能及,但“煤气化”后的技术,华理就需要与其他高校以及中石化之类的大企业合作,才能最终实现“能源替代”研究的全过程。为此,华理正在积极充实材料,重点就是与高校、企业的合作,也包括改革人事制度,希望在第二轮“2011计划”中入选。

和“211工程”、“985工程”相比,“2011计划”的一个重大改变是取消了终身制。据了解,对入选的协同创新中心,每4年是个评估周期,将对其人才培养、资源整合、科技成果转化、对行业产业的支撑作用以及国际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如果目标完成且国家有进一步的需求,才能进入下一个周期。可以预见,“2011计划”推动中国高校科研制度的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焦点关注】

对于教育部公布入选“2011计划”的首批14个项目,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2011计划”相较于以前的“211工程”、“985工程”来说有所创新,但这一计划还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推进,也就无法回避行政化问题。

熊丙奇说,有舆论解读称,“2011计划”是“产学研一体化”的2.0版,这比较形象。但新版是否解决了老版本的问题?我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产学研一体化”,可做得并不好。一方面,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很低,超过90%的科研成果在通过验收后就被束之高阁。另一方面,产学研一体化反而让大学充满浮躁之气,有的教授弄出一项发明,马上自立山头开公司。再就是,在科研项目中,学校间也有合作,可是在利益因素左右下,“合作”出现“五同现象”,即论证之初“同心同德”,制定计划时“同舟共济”,经费到手后“同床异梦”,遇到分歧时又“同室操戈”,最后变成“同归于尽”。

熊丙奇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我国大学严重行政化、功利化,缺乏现代大学制度。教育主管部门一定注意到了以上问题,但“2011计划”的推出说明,教育主管部门仍是用行政力量而不是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来解决上述问题。在行政管理思维下,“2011计划”很可能重演老版本的故事:没有办学自主权的大学很难有明确的办学定位;在行政指标的压力下,学校更加重视学术研究、产业服务,而难以理顺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产业服务三者的关系。因此,解决高校间科研能力分散、相互消耗,根本在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而行政化的“2011”不能替代现代大学制度。

不能替代现代大学制度